

城市與設計學報
第十三/十四期 2003 年 3 月
Cities and Design
No.13/14, March, 2003

廿一世紀的都市社會學*

曼威·柯司特**

劉益誠譯，夏鑄九校訂***

Urban Soci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nuel Castells**

Translated by Liu, I-Chan

Revised by Hsia, Chu-joe***

關鍵詞：社會整合、都市文化、都市社會學、資訊時代、都市轉化

Keywords: social integration, urban culture, urban sociology, information age, urban transformation.

* 收作日期：2002 年 5 月 15 日。
Received: May, 15, 2002。

增改前原文係作者為艾達·蘇莎 (Ida Susser) 所編著的《城市與社會理論科司特讀本》(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一書所寫的結論。(Susser, 2000:390-406) 作者為本刊中文讀者之所需，在 2002 年特別做了增修，加了前言。

** 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城市與區域規劃教授。

*** 劉益誠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通訊方式：kaygreat@pchome.com.tw；夏鑄九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通訊方式：hchujoe@ccms.ntu.edu.tw。



摘 要

1968年，作者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學術文章，“真的有都市社會學嗎？”。三十二年後，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段親身對於城市的社會研究的參與經驗，答案是：有，不過是以前有；沒有，現在沒有；但是，如果幸運點，會在廿一世紀復活，發展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題，因為都市社會學對於我們對生活的理解比過去更顯必要。作者特別針對華文讀者在論文前言說了一些有針對性的話，提供本刊城際網絡間的讀者參考。

Abstract

In 1968 the author published his first academic article, under the title “Is there an urban sociology?”. Thirty-two years later, with the hindsight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a life of practicing social research on cities, the answer is: yes, there was; no, there is currently not; but perhaps, with luck, it will resur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new concepts, new methods, and new themes, because it is more necessary than ever to make sense of our lives. The author especially says few words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for Chinese readers as well as the reference of the readers of this journal of intercity networking.



1. 前言

我們居住在都市世界中。地球上超過一半的人口現在住在都市地區。由聯合國提出的，得認真對待的預測指出，未來三十年中，這比例將達到三分之二。這個都市化的大部分，以數量而言，將在中國與印度發生。中國仍是一個大的農業國，但是幾乎所有的經濟成長、創新能力、文化發展、媒體傳播、與政治權力卻在於都市地區，特別是在最大的都會地區。以及在以後二十年內，中國的都市人口數量將至少增加一倍。巨大的城鄉移民過程會在中國發生，有些移往中小城市，但是大部分移往都會地區。這個轉化正在改變中國社會的物質結構。西方社會都市化的老模型，在規模與形貌上都與這個加速的都市化過程不夠吻合。譬如說，在台灣，一個都市連續體，由台北到高雄，沿著西海岸，聯繫起城市、城郊與城鎮。個別的城市並未消失，但是做為一個都會區域(metropolitan region)的部分，它們功能與特性都被重新界定了。同樣的發展發生在華南，譬如在香港與廣州之間，經由深圳與珠江三角洲，聯繫起珠海與澳門，正在形成的鉅形都會區域(mega-metropolitan region)。新的運輸與電信系統使這些都會區域在廣闊無垠的領土內部聯繫起來，以及同時，連結起世界上其他相似的區域：全球化地理學由餘留剩下的農村區域所依賴的大都會區之間連結的網絡所造成。在這個新空間結構下，生產關係、階級關係、權力關係、與文化體系都被重新界定。以芝加哥學派的功能主義範疇為基礎的舊都市社會學，不能提供這種分析所需的適當概念。1970 年代我幫著在法國發展的“新都市社會學”，也太直接聯繫著西方先進資本主義都市化經驗，以及太依賴馬克斯主義的架構而不能吻合我們都市全球變動的現實。這就是為何我們需要新的理論角度，永遠植基於經驗研究，而其研究者遍及世界，特別是中國的研究者，能夠對待了解，正在塑造中國、亞洲、以及最終全世界未來的社會空間轉化的新過程(a new process of socio-spatial transformation)。我希望後文所闡述的廿一世紀新都市社會學的趨勢，在亞洲的空間與社會的領導性理論家之一，夏鑄九教授的照應之下，在當前都市地景的轉化基礎上更新都市理論的工作，能有助於新一代的中國研究者的發展。



2. 一個回顧性展望

1968年我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學術文章，標題是“真的有都市社會學嗎？”（Castells, 1968）。經過三十二年，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段親身對於城市的社會研究的參與經驗，答案是：有，不過是以前有；沒有，現在沒有；但是，如果幸運點兒，會在廿一世紀復活，發展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題，因為都市社會學對於我們對生活的理解比過去更顯必要——對大多數的人來說，都必須在某種的都市地區繼續活著或是居住著。

都市社會學是現代社會科學創立的顯學之一。它起源於工業化後快速都市化所衍生的各種議題，以及面對數千年來做為人類生活方式的鄉村生活的衰頹。都市社會的建立圍繞著一個中心課題：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在一個新的，由鄉村移民組成的都市社會（urban society）裡，而在都市社會裡傳統社會整合制度已經因為都市人口增長、經濟發展、社會流動、以及社會衝突而土崩瓦解。因為以前的美國都會區就是成長、移民、變遷的縮影，他們提供了一個社會實驗室讓社會科學家們可以在這裡研究整合都市社會中的移民如何從鄉村與海外移居到這個新巴比倫（繁華與罪惡之都）的各種狀況。芝加哥正是這個社會鬥爭的中心（五月一日就是為了紀念那些在罷工中殉難芝加哥工人），布萊希特劇場的中心（屠宰場的聖詹尼），也包含當時一些最有創新能力的社會學家（Park et al., 1925；Zorbaugh, 1929；Wirth 1938）。他們創立起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社會學，並將都市社會學創建為一種有學術性的學科。

芝加哥學派對於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的觀點卻充斥意識形態的偏差——一個無視於階級、性別、族群差異的都市居民而表現一致的文化特徵，然而，透過對極端分化的地方社會裡社會整合的矛盾與狀況的強調，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們處理了當時美國社會裡的核心問題：如何在完全相異的社區以及競爭求存的個人之間打造社會。而這同時歐洲城市的問題還沒有這麼極端，但是關於處理都市—工業化脈絡底下農民、移民的社會互動模式的再建構議題卻一樣地尖銳，儘管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對都市問題興趣缺缺，而使得都市矛盾被化約為一種更廣義的階級衝突的次級面向。

透過社會整合研究，都市社會學聚焦於空間模式的研究，也被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們形式化了，並且將都市社會學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連結起來進一步成為大家熟知的人文生態學（人文區位學，human ecology）（Hawley, 1956；Schnore, 1965）。因此，人類聚落在社會競爭與社會選擇概念之下的形式與過程的研究，以及針對文化整合的



社會分析，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成爲都市社會學回應因工業化以及都市化所滋生各種歷史議題的基礎主題，然而他們的研究卻充滿意識形態地偏差。但先不管我跟芝加哥學派在理論以及政治上的歧異，都市社會學在芝加哥學派的影響下，因爲他們這些早期社會學家們的嚴謹以及想像力而開花結果，而他們當時所面對的重要議題則是新社會的形構、大都市市中心的空間組織等等。因爲這個學術傳統的力量，他們的主旨、方法、以及理論架構，比起其研究取徑的相關性，壽命長得多——可是歷史有其自身的驚奇，我在後面會仔細說明。

在六〇與七〇年代，普遍的社會問題，還有特殊的都市議題，已經與芝加哥學派那時所要處理的問題很不一樣了。社會/文化的整合不再是那麼重要的議題。對都市—工業社會控制與取向間的鬥爭變成都市問題中最重要的課題。此外，新社會運動的興起，在在挑戰了發展與工業化的概念，也亟需關於社會與自然關係的新形式以及經濟發展的新經驗。性別議題也開始變得重要。透過多重文化世界裡都市經驗的多樣性也被社會科學所察覺，也瞭解到了做爲西方化的現代化理論裡的種族中心主義是多麼地不適用。而透過社會服務控制以及公共寧適性（public amenities）的介入手段，國家廣泛地干預了人民生活，也成爲日常生活及都市過程的組織中重要的元素。每件事都劇烈地在爭奪，論辯，爭吵搏鬥，並且在互相衝突的利益以及另類出路的計劃（alternative projects）所代表的社會團體間進行協商，使得想在一個共享的文化底下得到整合的這種概念被徹底地揚棄。結果，根據這種新的社會現實產生了新的都市社會學。這種新的都市社會學在歐洲、美國有不同的走向，在美國，多元論的政治科學觀點把政治衝突及協議(bargaining)擺在都市社會分析的中心（Banfield and Wilson, 1963；Mollenkopf, 1983）。當時，我不同意把社會行動者與利益團體外在於他們的階級利益以及文化架構的侷限之外進行討論。都市政治科學的取徑，他們的哲學基礎來自於自由主義的傳統，表現出與社會整合的決裂，並把這個衝突與協商(negotiation)置於都市社會科學的中心位置。然而，因爲這樣，以後的知識史學者應該會在研究中發現，這正是爲什麼在七〇年代都市社會學的領域裡一股稱之爲“新都市社會學”頑強地復甦。新都市社會學起源於法國，主要導因於兩個在知識上不一致的兩個個體的著作：一個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68），另一個則是我本人。新都市社會學，因此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思想學派，而是被四主題所建構起來，兩個主題爲第一位理論家介入，另兩個主題則爲第二位擔綱。前兩個主題，後來被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及愛德華·索雅（Edward Soja）繼續探究，主要是關於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以及對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空間被視為是一個生產的過程（例如資本主義生產），他們的結論最終導向將人們的生活架構在空間上強迫束縛的模式裡。必然的結果是，當資本無法認為它可獲利或是使人們留在城市中，因為還是需要都市工人所以又沒辦法把都市人口再塞回鄉村時，一個新的、中介的空間就被打造出來：城郊(suburb)——在歐洲的狀況是城郊的大量出現與工人階級有關；美國的情形則是與核心家庭以及中產階級有關，但兩者都是反都市的（anti-urban）。所以，當人們被逐出鄉村後，他們又被迫逐出，或者是被誘使遷出他們曾經是可居的地方。現在他們的確失去了他們對城市的權利。

新都市社會學中另外兩個批判性的主題則是關於**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及**都市社會運動(urban social movements)**。城市被視為是一個組織起來好提供每日生活所需各種服務的系統，並且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國家的指導/控制。住宅、運輸、學校、健康照顧、社會服務、文化設施、以及舒適的都市環境，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經濟領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透過國家干預進行生產或履行期望（好比歐洲的公共住宅以及公共運輸，美國的聯邦儲備住宅抵押以及補助公路系統）。集體消費（就是國家中介的消費過程）同時成為都市基礎建設的基本項，並成為人民與國家的主要關係。城市被再界定為資本積累與社會分配之間、國家控制與人民自主性之間衝突與衝突的焦點。環繞著這些議題，**新都市社會運動**——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對社區生活的掌控以及對集體消費的需求——出現，成為一種面對社會衝突與政治權力的新行動者(new actors)。都市社會學於是上下翻轉，從研究社會整合的學術訓練轉向對後工業主義新社會衝突的研究。

但緊接著，就在二十世紀的最後這幾年，竟然是一片死寂。都市社會學倒退回幽暗的角落，儘管學術工作者依舊按部就班地進行研究而學術期刊也忠於職守地正常出版千計的論文試圖再闡述、再研究、再精鍊這兩波都市社會學的浪潮，1920-30年代以及1960-70年代，所帶起的議題、主旨、以及概念。然而，大部份來說，都市社會學已經無法把城市、空間以及社會中大部份的議題連結起來。“新都市社會學”已經在面對新的都市脈絡時顯得過時，在面對資訊時代的早期階段，就像是芝加哥學派在面對成熟工業社會時遭到揚棄一般。學生與研究者在面對都市社會學時缺乏新鮮刺激的感覺，正反映了這門學問在面對現實世界正在發生的挑戰時靈感的枯竭。

為了瞭解都市社會學在千禧年轉向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危機，以及在知識上重建的方法，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嶄新的歷史時期裡的城市與都市議題的轉化，也就是我概念化界定的資訊時代(Information Age)。這可能是一條蜿蜒曲折的改造，但是我曾經對這個概念進行分析，可以參考“在資訊時代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Castells, 1999)。接著，在這裡我將簡單指出廿一世紀的都市社會學該回答的一個問題：怎麼把世紀翻轉之際的都市轉化（urban transformation）主要趨勢聯繫到對理論的挑戰。

3. 一個新的都市世界

空間轉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必須被擺在一個更廣的社會轉化的脈絡下來理解：空間不只是反映（reflect）了社會，空間還表現（express）了社會，也是社會的基本向度之一，無法從社會組織及社會變遷的整體過程中被分離出來。因此，新都市世界從我以前分析的新社會浮現的形構中被提出來，也就是網絡社會，這也是資訊時代的特色，並且是在資訊—技術革命、社會—經濟再結構、以及文化社會運動交互作用下產生的結果。關係著宏觀—結構變遷的空間模式及都市過程的主要發展，有以下幾個要點：

- 因為以營利角度出發的商務農業（commercial agriculture）的出現，在很大的程度上，自動化，以及遍及全世界的全球經濟整合的生產網絡下，幾乎大部份的人口都已經居住在都市裡，這使得下面的情形逐漸增加：我們正朝向一個到本世紀中葉會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人口聚集的都市化世界的方向而去。

- 這個都市化的過程以一種不均衡、不相稱的方式集中在幾個都會區：他們星羅棋佈地在地表疆域上擴張，並且在多重中心的結構上進行功能整合以及社會分化。

- 先進的電信（telecommunications）設備，如網際網路（互聯網，Internet），還有更快速、電腦化的傳輸系統造成同時性的空間集中與分散，這導致一個遍佈全世界、遍布全國、在都會區之間、在都會區內部的，網絡與都市節點的新地理學。

- 社會關係的特色則是同時被個體性（individuation）與社區共同性（communalism）¹影響，這兩個過程同時兼具了空間的模式以及即時線上的傳播與通訊（on-line communication）。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ies）與實質存在社區（physical communities），因密切互動而發展，這兩者的集合過程則備受這些快速成長的個體化的工作、社會關係以及居住習性的挑戰。

¹ 此處的個體性（individuation）指賦與個性，而社區共同性（communalism）指涉地方自治體、社區共同體與公共的、共享、共有的意涵。



· 父權家庭 (patriarchal family) 危機，根據經濟發展的程度以及文化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言行顯示，把社會交往性 (sociability) 從家庭單位轉移到個體化單位的網絡上 (常常是婦女與她們的兒童，但也是個體化、同居的夥伴關係 (individualized co-habiting partnerships))，而這種轉變對家庭、鄰里、公共空間以及運輸系統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

· 網絡企業作為一種經濟活動新形式的浮現，伴隨著高度去集中化、然卻是統籌了的，工作及管理形式，慢慢模糊了勞動空間與居住空間在功能上的區分。以前在早期工業手工藝時代時那種工作—住家混雜的特色現在好像又出現了，進而佔據了過去的工業區，並且把這些空間轉化成資訊生產空間。這不只是紐約的矽巷 (Silicon Alley)、舊金山的多媒體峽谷 (Multimedia Gulch)，倫敦、巴塞隆納、東京、台北²以及布宜諾司艾利斯等其他的許多城市也是如此。在解釋都市空間新動力這一點上，生產用途的轉型比居住形式的延續變得更重要。

· 全世界的都市地區，尤其是在已發展國家的世界，逐漸地多族群、多文化了；這是芝加哥學派的老主題，就極端多樣差異的種族組成而言，現在該詳加考察。

· 全球犯罪經濟確實已經牢牢根植在都市織理之中，並且還對犯罪文化製造出一整套的就業、收入乃至社會組織，而且深深地影響了低收入社區、或大城市裡的生活。這造成了暴力以及都市暴力中廣泛的偏執狂大幅增加，這也導致防禦式住宅模式的必然產生。

· 個體之間以及文化之間的溝通模式也被摧毀，以及防禦性空間的出現，導致尖銳的隔離地區：有錢人的門禁森嚴社區與窮人的勢力地盤。

· 在反對城郊蔓延以及住宅模式個人化的趨勢中，都市中心和公共空間變成地方生活的關鍵表現，可度量一個既有城市的活力。然而，在商業壓力與模仿都市生活的人為努力常常把公共空間改造成了主題公園，在那裡透過象徵而不是經驗，來創造生活的型號 (life-size)，都市的虛擬真實，最終注定成為投射在媒體中的真實虛擬。這對個體化的程度言，都市空間變成個人占用的消費項目了。

· 總之，新都市世界看來似乎被編入 (inclusion) 跨界網絡、以及為地方的空間分隔所排除 (exclusion) 的雙重運動所支配。人與空間的價值越高，他們就越連結於互動式網絡之中。價值要是越低，連結就越低。極端地說，對新網絡地理學而言，某些地方像是蕭條的鄉村或是都市的簡陋小屋形成的市鎮 (shanty town)，網絡常被切斷 (switch off) 或是繞道而行 (bypass)。

² 如原來台北市的內湖輕工業區已經轉換成內湖科技園區。



· 鉅型都會區域 (mega-metropolitan regions) 的建構，卻沒有名義、文化與制度，削弱了政治責任、市民參與、與效率管理的機制。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時代，地方政府卻變成更有彈性的制度行動者，它們能在同時把地方居民跟全球流動的權力跟財富關連起來；之所以能如此並不是因為它們有權力，而是在政府的許多層級裡，包含民(國)族國家，如果它們還是孤立運作的話那它們的發號司令與控制能力都會被削弱。因此，整合出一個超國家的制度好把民族國家、中央政府、區域政府、地方政府、甚至是非政府組織，組合起來，也就是網絡國家 (network state)，一種國家新形式的浮現。地方政府變成制度性代表與管理鍊中的節點 (node)，能夠投入整體重組過程，並可以在一更接近的層級代表市民的能力的角度，來提升其附加價值。事實上，在很多國家，許多民意調查顯示人民對自己的地方政府有較高程度的信任，至少跟其他層級的政府組織比較起來是如此。然而，都會治理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的制度卻很少 (當它存在時，它是高度集中、但是甚少市民參與的制度)，並且在工作與生活 (都會區域) 的實際單位，以及政治代表性與公共行政的機制之間，都顯現出愈來愈大的鴻溝。地方政府透過合作以及競爭相互補償，然而，地方政府的利益被定義為都會區域的次等地位，使它們 (常常是心不甘情不願地) 促成了社會生活的空間架構進一步的片斷化。

· 不論怎麼來看，都市社會運動都不會消失。但是他們已經產生變種。在一個極端概要的陳述下，都市社會運動的發展會沿著兩條路線。第一條是保衛地方社區，也就是肯定居住於特定地方的權利，並且得益於這地方能滿足需要的住宅與都市服務的權利。第二條路則是環境運動，為了一個廣義的、更好的生活品質的城市品質而行事：不只是一個更好的生活還更要是一個不同的生活。這個更廣義的環境動員會將一個防禦性的行動轉換成保護一個特定社區的行動，這使得這兩種都市運動的趨勢合流。所以，只有延伸到那些生態思想者與運動者所說的，都市生活裡的文化轉化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之後，都市社會運動才能超越地方主義 (localism) 的限制。事實上，當把自己含括進社區裡之後，都市社會運動才促成了進一步的空間片斷化，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

面對這些目前主要的都市社會變遷 (urban social change) 趨勢的背景，也是我們能重新思考未來幾年都市社會學的議題、主旨與前景。



4. 全新的都市社會學

從對都市趨勢的觀察過渡到都市社會學的新理論化過程，我們需要能掌握，至少在更分析性的層次上，社會—空間變遷的關鍵因素。我認爲城市在資訊時代的轉化，可用三條軸線所組織起來：第一條關乎功能，第二是意義，第三則是形式。

功能上說，網絡社會是由全球（**global**）與地方（**local**）兩個相對體所組織起來的。經濟、技術、媒體與制度化權威當局的支配過程都是組織在全球網絡之中。但是在大家的每日工作、私人生活、文化認同、和政治參與則本質上是地方的。城市便被認爲是聯繫地方與全球，但是事實上這兩種矛盾的運作邏輯並存在城市中卻產生了問題，那就是當這兩者試圖同時互相回應彼此時把城市從內部撕扯開了。

就意義而論，我們的社會的特性就是個體性（**individuation**）與社區共同性社區共同性（**communalism**）間對立的發展。個體性，我認爲它被許多個人的計劃、利益、以及代表性的意義所環繞；也就是在生物學上具體體現的人格系統（或者是法國結構主義意義的，一個人），而社區共同性，我認爲它爲所共享認同（**a shared identity**）的意義所環繞，奠基在價值與信仰的系統上，而其它的認同則被視爲是次要的部份。社會，當然只存在個人以及制度中介的認同之間的介面，這也是“市民社會”建構的來源——這也是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論證的，市民社會不是與國家對立而是與國家接合（**articulation**），按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說法，形成一個共享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而我觀察網絡社會的形成階段，人格與文化之間、個體性與社區共同性之間，漸漸出現緊張與距離。因爲城市是個體大量聚集，並迫使他們必須混居在一起，以及大部分的社區共同體的聚居，在個體性與社區共同性的分裂，造成城市的社會系統，好比在溝通和制度性手段間，帶來異常的壓力。社會整合的問題又成爲一個重要的議題，雖然現在這個極爲不同的情形，已經跟早期工業城市裡的社會整合的問題已經完全不同了。

這是因爲第三點都市轉化所扮演的角色的關係，而這正是這三條軸線中相對最主要的一支，也就是空間的形式。這涉及到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之間的張力與接合，我曾經界定過（**Castells, 1996:ch.6**）。流動空間透過電子科技的互動式網絡聯繫分離的地方把不同地方的行動與人群連結起來。地方空間則組織起每個地方的範圍內經驗與活動。城市則同時被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這兩個競爭的邏輯結構與解構。城市並沒有在虛擬的網絡中消失不見。他們只是透過電子傳播通訊以及實際互動、還有網絡與地方之間的結合的介面被



轉化。例如威廉·米歇爾(William Mitchel, 1999)，他從都市研究的觀點出發，貝利·威爾曼(Barry Wellman, 1998)，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他們都在論證資訊化城市是怎樣經由環繞著的雙元傳播通訊系統所打造出來。我們的城市同時被流動及地方，還有兩者的關係所構成。我舉兩個例子來幫助我們領會這句話，一個從都市結構的觀點，另一個從都市經驗的角度。從結構上來說，“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這個概念從1990年左右開始流行起來，雖然許多人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就是像倫敦、紐約、東京這類的統治類型城市中心才叫做全球城市，但是全球城市這個概念(Castells, 1989; Sassen, 1991)並不是指任何特殊的城市，而是能把許多城市不同區段(segments)導進一個以電子科技串連的全球功能性支配(domination)的網絡裡。全球城市是一種空間的形式而不只是某種城市區分出來的頭銜，雖然某些城市在這個全球網絡上比起其它的某些城市分擔了更重要的位置。就某種意義來說，所有城市的大部份地區，包括紐約與倫敦，都是地方的，而不是全球的。許多城市是地區的基地，不論大或小，並且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包含在全球網絡裡面。把全球城市當成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種空間形式，這樣與一般常見的以城市行銷機構比較起來，事實上更符合莎斯琦雅·莎珊(Saskia Sassen)原創性的分析。因此，從結構的觀點來看，城市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取決於他們在運輸與電信網絡中的連結性(connectivity)，以及城市是否有能力在全球競爭的過程中有效率地動員人力資源。在這種趨勢下，連結全球經濟的城市的節點地區，在投資與管理上將得到最高的優先性，因為它們是都市節點及其周圍地區生計掌握價值創造的資源。因此，都會區經濟的命運就仰賴於他們有沒有能力以確保它們在流動的全球空間中保有其具有競爭性接合(competitive articulation)的某些地方的動力為主，而以所有其他的都市功能與形式為次。

從都市經驗的觀點，我們漸漸進入一個逐漸整合在一個電子傳播通訊無所不在的速成環境裡。我們的都市生活織理，如米契爾(Mitchell, 1999)所說的，變成了一個電子邦(e-topia)，在這個新的都市形式裡我們持續地、謹慎地、並自動化地透過即時線上的資訊系統進行。在物質上，流動空間被包含在地方空間裡面。儘管他們的邏輯卻是不一樣的：即時線上的經驗與面對面的經驗依舊是特殊的，然後，關鍵問題將是確保它們以相容的方式接合。以上的評論可以有助於都市社會學理論的重新裝備，以回應網絡社會的挑戰，這與新空間形式與過程的出現是互相一致的。



5. 廿一世紀都市社會學的主旨

現在應該很清楚為什麼社會整合對都市社會學來說又變成一個重要的議題了。事實上，不管生活在都市世界中，城市做為溝通的人造物存在，社會整合一直是一個問題。但是在危急關頭時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整合。在二十世紀前期所要的只是把都市裡的次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成一個都市文化。而在廿一世紀前期面臨的挑戰是不同的文化與認同如何分享(sharing)一個城市的問題。已經不可能再有一個支配性的文化，因為只有全球性的媒體有力量去傳送一個支配性的訊息，而媒體事實上已經適應於他所處的市場，並依賴需求建構出一個不同資訊內容的萬花筒，再生產文化與個人多樣性，而更勝於疊加上共同的價值。水平傳播通訊的擴展經由網際網路(互聯網)則加速了片斷化以及象徵互動個體化的過程。所以，片斷化的都會以及傳播通訊的個體性強化了互相產生無止盡的文化次領域的星群。對於公共領域的鄉愁將無法與這種多樣化、專門化、以及個體化的生活、工作、空間、以及面對面或者透過電子溝通、傳播通訊的結構性趨勢相抗衡。另一方面，社區共同性在個體區段化(segmentation)化裡添加上了集體的片斷化(fragmentation)。因此，雖然缺少一個統一的文化，以及一個統一的符碼，但關鍵的問題就不再是是否分享一個支配性的文化，而是多重符碼間的溝通、傳播通訊能力(communicability of multiple code)。因為這不是一篇政策文章而是一篇理論性的文本，所以討論的問題就不是該做什麼好恢復溝通傳播與通訊(例如城市生活)，而是如何研究這個過程。關於象徵溝通傳播與通訊規則(symbolic communication protocol)的觀點在這裡變得重要，這個規則可以是實質物理的、社會的、電子的、額外的規則，對於相關的三個多重向度經驗的不同階段而言也變得是必要的。

實質物理地，在這些無名的都市星群(urban constellations)裡意義的建立與新的紀念性(monumentality)的出現以及象徵中心性(symbolic centrality)的新形式有關，而這些也會辯認地方，即使是被不同的群體或個體有衝突性的占用了它們的意義。都市記號學似乎驚人地在這時顯露在新都市研究的最前列，使我們有能力瞭解好比天主堂或阿果拉(agora)³怎麼建造起來的過程，不論在這個資訊時代裡它們的形式有多麼的令人驚異。然而，都市記號學在方法論上的先決條件是必須要回到形式語言學上的理論起源，只不過它採用了新的研究調查工具以及電腦化的模型，取代了早期隱喻性的註釋以及詮釋性的敘事。

³ 希臘城市中心的開放空間，集會的廣場。



象徵分析的第二個層次是它指涉了社會溝通、傳達與通訊的模式。在這裡，地方生活表現的多樣性以及它們與媒體文化的關係，必須藉由不只是隨口說說而以還要實際運作的過程而被整合進一個溝通傳播與通訊理論的架構內。換句話說，訊息怎樣從一個社會群體被傳送到另一個社會群體，好比從一個大都會區域內把某個意義播送為另外一個意義，這需要的對公共領域觀點的再定義——從制度變成公共空間。公共空間，做為自發地社會互動的基地，是我們社會裡溝通的手段，而一個形式上的政治制度已經變成專門化的領域並且很難再影響人們的私人生活時，公共空間就是大多數人所持有的價值。因此，這並不是政治 (politics) 或地方政治 (local politics) 一點都不重要。而是公共空間的關連性 (relevance) 被工具性的世界所限制，只要有豐富的表現力，所以溝通、傳播與通訊就成為外在於制度邊界的社會實踐。所以，在城市裡的實踐中，它的公共空間，包括了它的運輸網絡及社會交換者 (或者溝通、傳播與通訊的節點)，成為一個城市生活裡的溝通、傳播與通訊的手段。人要如何能、或如何不能，在家之外與不透過電子迴路，即，在公共空間中，充分表達他們自己，以及相互進行溝通、傳播與通訊。這公共地方就是都市社會學研究的基本領域。我把這個領域稱作為在個體化都會中公共地方的社會交往性 (the sociability of public places)。

溝通的第三個層次就是電子通訊作為一種新形式的社會交往性的普及程度。根據威爾曼 (Wellman, 1999) 以及瓊斯 (Jones, 1998) 還有其他為數眾多的研究，告訴我們電子通訊網絡的密度與強度會是維持虛擬社區可以算是一個社區的重要證據。儘管這跟日常生活中面對面接觸的社區是不同的形式。這裡再一次說明了奠基在特殊利益及價值之上的不同通訊網絡以及實質互動之間的溝通傳播與通訊符碼的理解是多重要的事情。只是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理論是專門針對這個透過網際網路 (互聯網) 過程進行的溝通傳播與通訊過程。但是我們知道即時線上的社會交往性是具體的而且那些實質的區位也會對電子通訊網絡做出具體貢獻。虛擬社區社會學是新都市社會學的第三條發展軸線。

再來，對於新都市世界裡的共享符碼 (code-sharing) 的分析也會需要關於實質佈局、社會組織以及電子網絡之間介面的研究。米歇爾 (Mitchell, 1999) 認為這個界面是新的都市形式的中心，並稱之為電子邦 (e-topia)。他的觀察非常具有洞察力，現在我們需要將它轉化為研究。相同的特色，但是從不同的角度，葛拉翰及馬爾文 (Graham & Marvin, 2001) 研究分析指出都市基礎設施是分裂成碎片的網絡，為都市文明的新電子管線所重新配備，開啓了瞭解城市的視角，城市不僅僅是溝通、傳播與通信的系統，而且是深思熟慮的區段化的機器。換句話說，我們必須認識到同時溝通與不溝通的



過程。在新都會中心性間那些矛盾／或互補的關係，公共空間的實踐，以及新溝通傳播與通訊模式，可以為都市社會學從虛擬社區裡浮現新的多樣性打下基礎。“受控機體城市（cyborg city）⁴”的社會學，或是為糾纏的流動與地方所塑造的混血城市。

我們可以在這些都市社會學新主題的探索上走更遠一點。我們知道電信（telecommuting）——這表示人們可以幾乎二十四小時在家裡從事即時線上的工作——是未來學裡的一個迷思。很多人，包括我們在內，雖然可以在家裡透過即時線上的方式工作，但是還是需要進入工作地方，好與自己專業伙伴、廠商、客戶之間的網絡維持一個可移動的連結性。這才是在工作領域上真實的新空間向度。這是一個嶄新的工作經驗，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新的生活經驗了。維持一個把所有東西聯繫起來的網絡，顯著地移動成了我們還不清楚的人類探險的新領域。網絡化的空間移動性（networked spatial mobility）社會學成了另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為了研究這個領域我們不只要對它進行單獨描述，我們還需要新的概念。在這些連結的多變幾何形勢之下我們必須瞭解地方與網絡間的連絡連結。流動空間的地方（the places of the space of flows）——把世界各地串連起來的這些走廊與門廳——將必須被當成交換者或社會避風港，好比奔波中的家庭或忙碌中的辦公室。對這些地方的個人與文化的認同，它們的功能性，它們的象徵性，還是必要的事情，除了那些特別的寰宇菁英（cosmopolitan elite）以外。世界性的大眾觀光旅行，國際移民，還有短暫的工作，都讓我們感受到與世界各地就擠在一起的群眾有關係。我們如何由過機場、火車與公車站、高速公路、海關關係著成千上萬人新都市經驗的部分。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民族誌研究傳統，提出關於這種成熟工業社會的這些研究議題。但這裡，一再地，關於運輸系統的速度、複雜性等等，議題的規模與意義都已經改變了。此外，主要的提醒是，我們實質地移動卻繼續保持家進我們的電子連結。我們帶著流動，以及移動，橫越過地方。

廿一世紀的都市生活也會被父權危機所轉化。這並不是因為技術變遷造成的結果，這在我寫的《認同的力量》一書裡已經論證過（Castells, 1997），這是資訊時代的基本特徵。肯定，父權並不是就在歷史上消失。然而它已經爭論夠多，也夠克服它，因此奠基在相對穩定的父權制核心小家庭的工業社會的傳統模式相當部分城市居民的每日生活被重新定義了。在性別平等的條件下，以及在忍受家庭形構的傳統安排壓力下，都市生活的形勢與韻律被戲劇性地改變了。居住的模式、運輸、購物、教育、還有娛樂，都要去調節配

⁴ 即 cybernetic organisms，由科技與通訊所串聯的生化複合體。



合個人以及家庭所需要的多重面向。這個轉變透過國家政策的才能達到。舉例來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在大部份的時間與空間狀況下要如何對待托嬰育兒—是藉由政府、公司、市場或個人網絡。我們也已經知道女性在父權城市裡是如何地被歧視。我們甚至可以在經驗上舉例說明（Castells, 1999），女性的工作使城市可以順利運作下去，但是在都市研究的文獻裡就是很少提到這個部份。所以我們需要繼續向前，從只是對於對現象的批判更進一步地去對具體的都市矛盾進行分析，而這個矛盾又是因為去性別（de-gendering）社會裡，以及家庭與都市結構裡父權制的歷史具體化，兩者所共同滋生的不一致所造成。這些矛盾怎麼出現？人們克服這個性別劃分的營造環境的策略是什麼？對於於這個已經充斥千年來盡是男性遺產的城市裡，女性又要如何特別地重新發明都市生活，並對屬於女性城市的再設計做出貢獻？這些問題都有待被擺在一個後父權的都市社會學裡被研究，而不只是提出問題就交差了事。

草根的運動依舊能塑造城市，也塑造整個社會。它們為各種形態與意識形態作用，我們應該對這事情保持開放心胸，不要領先決定哪個是進步的，而哪些又是退化的，那就把它們所有都視為在形成中的社會徵候。我們也應記住研究社會運動最根本的規則。它們就是它們所宣稱的樣子。它們是它們自身的意識。我們可以研究它們的來源，建立起它們約定的規則，研究它們勝利或失敗的道理，將其結果與全部的社會轉化聯繫起來，只不過不要去詮釋它們，也不要去解釋它們所說的到底是什麼意義。因為，畢竟，社會運動就是為了針對所設定的目標與象徵，這終極就是它們所說的意思。基於對網絡社會早期階段社會運動的觀察，都市社會科學家必須對兩個議題的出現優先注意。首先是我所說的“流動空間的草根化”，那就是用網際網路（互聯網）做為社會動員與社會挑戰的網絡。這不只是簡單的技術議題，因為它還關乎組織、可及範圍、以及社會運動的形構過程。許多“即時線上”的社會運動都是這樣先串連起以地方為基礎的運動，以及他們實質地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特定的地方聚合。1999年十二月在西雅圖舉行的WTO會議的動員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次，可辯論地，確立了草根群眾對抗不受抑制的全球化的新趨勢，以及重新界定了對新經濟的目標及程序的爭議。即時線上的社會運動的社會學，以及這個社會運動與地方為基礎的參考架構（它可以是多重的）的互動，指定了一個都市社會運動研究的新任務，並且改寫了1960年代的1970年代以來都市研究者的傳統。

其他社會運動的重要議題好比環境運動的研究，社會組織的生態學觀點，以及都市地區變成全球與地方兩者間的連結點：環境主義提出的全球議題，以及，地方經驗。由此人們可以整個評估他們的生活品質。要再界定城市為生態系統，以及研究地方生態系統與



全球生態系統之間的連結，替日後經過草根運動而克服地方主義鋪砌了基礎。另一方面，這種連結不能只是就生態學知識方面來操作。環境運動的暗示，以及清楚地接合“深度生態學”理論，如卡普拉（Capra，1996）所再形構的，這是文化轉化的觀點。一種新的文明，不只是簡單的新的技術範型，要求的是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創造需要經過許多利益以及文化計劃的爭吵拼搏才能達成。環境主義其實是一個進行這種文化戰爭的符碼，而都市的生態議題正好給這個爭鬥提供了關鍵性的戰場。

除了要能掌握這些新的議題外，都市社會學要持續計算在廿一世紀裡依舊存在的都市貧窮，族群與社會歧視以及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問題。事實上，最近的研究已經指出社會邊緣性以及網絡社會的不平等都有增加。而且那些老問題在新的都市脈絡下也有了新的改變。所以，艾達·蘇莎（Ida Susser，1997）的研究就指出潛藏的網絡邏輯，愛滋病的規模是沿著紐約窮人的窮困、污名及歧視的網絡而擴展的。艾瑞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2000）對1995年芝加哥熱浪諷刺性影響的社會解剖，也指出為什麼幾天之中上百的老人的命運都是在城裡獨自死亡，這就是根植在被工作、家庭、資訊、與社會交往網絡排除的社會孤立新形式中。在網絡社會裡編入（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的辯證關係再界定了對都市貧窮的研究領域，並迫使我們去探討一個另類的編入形式（例如社會團結或是否則，犯罪經濟），以及新的排除機制——好比在這個網際網路（互聯網）年代裡對於科技的種族隔離。

都市研究的最後一個新領域，事實上就是對於整體的社會科學本身，就是關於在資訊時代的時空新關係的研究。我已經提出一個關於永恆時間（timeless time）浮現的觀點做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特徵，並且平行於流動空間的形構。永恆時間，我指的是對於依時間前後排列而記載的時間來源的序列的解構，不是由於時間壓縮（例如即時線上的電子市場裡的金融交換）就是序列模糊（好比在一週或一生中不連續、不是由於工作時間模式）。同樣地，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是並存的與相矛盾的；而永恆時間與排序時間（chronological time）也是並存的，但是與冰河時間（glacial time）卻是相對的，也就是說，一個緩慢的步調與一個生態過程構成地球的生態系的特徵。每個時間與空間的形式都是透過社會行動者而具體化，並且在社會組織裡被形式化，並且一直處於流動的狀態，好比一個實際的時空過程有賴於整體的社會變遷過程一樣。在我對於工業社會的新時空關係的分析裡，我提出一個假設，在網絡社會裡，是由空間來結構時間，這跟工業社會裡是由時間來支配空間的建構不一樣，並且網絡社會裡的都市化與工業化是普同進步步伐的一部份，會抹除以地方為根基的傳統與文化。在我們的社會裡，網絡社會，你生活居住決定你



所參考的時間架構。如果你是流動空間裡的一員，或你居住於支配性網絡的地域，永恆時間（要命競賽脈動的縮影）將會是你的時間。好比如果你身處矽谷或華爾街。如果你是在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城鎮裡，排序時間就會壓在你的身上好比最好時候的底特律市的泰勒化式的生活。又如果你住在窮鄉僻壤，好比瓜地馬拉的亞蒂蘭湖邊，那麼生物時間一個較短的生命週期（life-span）依舊會規定你的生活。不同於時間的空間決定，環境運動主張“慢速時間”，“長時間的鐘”，照布蘭德（Brand，1999）的用法，透過把空間面向放大到一個全球性的規模——已經把我們後代子孫都含括進我們的時間架構裡。所以，新都市社會學必須要在廿一世紀裡擔負起新的責任——而這只有在有了新的概念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協助下才能完成。

6. 研究戰壕中的都市社學家

針對我所舉出的這些特殊議題所再生的一個新都市社會學，必須要創造出新的工具，包括理論上跟方法論（methodology）上。都市社會學也必須拋棄以前那些圍繞著大部份在後現代理論的文字遊戲下產生的解構跟重構的無用實驗，並且，在田野研究中，在新資訊的收集中，在發現社會隱藏的領域裡，以及在所有迷人與悲慘的都市生活銷魂魅力中回歸它的源頭。我們不需要新的都市意識形態或善意的烏托邦——我們應該讓人們想像他們自己的神話。廿一世紀的都市社會學家所真正需要的是新的工具箱（包括概念性工具），以便能展開必要的研究與瞭解新的空間與社會關係的堅苦工作。

概念：網絡、流動空間、地方空間、地域、全球、社區（不管是實實物理的或虛擬的、面對面的）、都市社會交換者（urban social exchanger）、移動的地方（mobile places）、去性別的家庭及城市、切斷的地域（switched-off locales）、編入聯繫（links of inclusion）、全球在地社會運動（glocal social movements）、共享時間/空間、時—空體制（time-space regimes）、個體性、社區共同性、都市星雲（urban constellations）、都會區域、都市紀念性（urban monumentality）、多節點中心性（multi-nodal centrality）、意義、功能、形式。我提的這些讀起來像是包格（Borger）的中國百科全書似的概念清單是為了要組成並集合這些概念，或至少要定義它們，這才能建構出一個理論架構，但這不是我在這篇文章裡的目的，雖然這項工作以後要被完成。我簡單地希望指出一個調查的風格，並希望引出某些概念，它們能提出對我認為廿一世紀城市關鍵的問題，適合研究的設



計。對讀者而言我在這篇文章所強調的東西已經感到厭煩，但我還是要指出我一開始所說的關於網絡社會系統理論化的工作（Castells, 2000），這個觀點需要被特別擺在城市與空間過程的研究裡。

都市社會學家也需要新的方法（methods）。網際網路（互聯網）不只是一個研究的對象，而且是一個研究工具。它提供了一個機會接近各種不同的資料。經由自動翻譯軟體的協助，網際網路（互聯網）將能增加各種資料以及都市研究議題的真實多文化主義的面向。要在全球角度底下來掌握全球系統，即使分析的起點依舊是文化或制度的特殊單一部份。新的電腦運算功能、以及它無遠弗界的散佈、至少提供我們對質化材料基礎之上的假設的形成跟驗證模擬的功能。對於複雜性的新數學，已經因為更快速的電腦運算而威力倍增，將會使得統計分析從一個線性的限制中解放出來，瞭解社會現實而不再是線性的統計形式。怎麼去做民族誌田野依舊是一個本質上非常不同的都市社會科學的研究工具，但是現在，新的技術工具使研究者更能去記錄、檢驗、分析他們對照資料庫後所做出的觀察。移動的運算能力，即時線上的與分析系統的連結以及互動性，使都市社會科學家們能將質化觀察系統化，並且在進行田野研究時建立起他們的資料庫，並且在他們觀察與訪談以便獲得分析架構的觀察意義時有所回饋。

有了這些新的工具，都市社會學要負起一個責任去使得廿一世紀都市社會學家們繼續對城市保持熱情，並且對跟他們一起相處的市民有感情，那正是我們這些早期的都市社會學家在廿世紀的感受啊。



參考文獻

- Banfield, E. and Wilson, J. Q. (1963) *City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and, Stewart (1999) *The Clock of the Long Now*,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pra, Fritjof (1996) *The Web of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Castells, Manuel (1968) "Y a-t-il une sociologie urbaine?," *Sociologie du Travail*, 1: 72-90.
- Castells, 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anuel (1995) "L'écol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urbaine vingt ans après," *Les Annales de la Recherche Urbaine*, 64: 58-60.
- Castells, Manuel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anuel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anuel (1999) "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Frontiers of the Min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une 14-18; also in Susser, Ida (2000)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367-389.
- Castells, Manuel (2000) "Materials for an Exploratory Theory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5-24.
- Graham, Stephen and Marvin, Simon (2001) *Splintering Urbanism*, London: Routledge.
- Harvey, Davi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wley, Amos (1956) *Human Ec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Jones, Stephen (ed.) (1998) *Cybersociety 2.0*, London: Sage.
- Klinenberg, Eric (2000) "The Social Anatomy of a Natural Disaster: the Chicago Heat Wave of 1995,"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rkeley, California.
- Lefebvre, Henri (1968) *Le droit a la ville*, Paris: Anthropos.
- Mitchell, William J. (1999) *E-top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ollenkopf, John (1983) *The Contested C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rk, R. E., Burgess, E. W., and McKenzie, R. D. (1925)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nore, Leo F. (1965) *The Urban Scene*,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sser, Ida (1997) "Inequality, Violence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 Global City: New York, 1986-96,"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5 (2).

Susser, Ida (2000)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Wellman, Barry (ed.) (1999)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Wheeler, James O. and Aoyoma, Yuko (eds) (2000) *Citie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ge*, London: Routledge.

Woo, Edward S. W. (1994) "Urban Development," in Y. M. Yeung and David K. Y. Chu (eds), *Guandong: Survey of a Provinc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Zukin, Sharon (1992) *Landscape of Pow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